

小说中的政治世界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的一种诠释

潘一禾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3)

摘要: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小说中的动物乌托邦从建立到衰坏, 迅速地从起点回到了起点。奥威尔通过塑造一系列重要的动物形象来表达自己深入的社会观察和睿智的政治见解。作者希望后人能找到走出政治幽暗的理性和摆脱“强权轮转”命运的实践之路。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 政治寓言小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08) 02 - 0030 - 07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 1945 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当时二战刚刚结束, 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在双方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冷战中, 这部小说曾经被双方用作仇视对方阵营的缘故之一, 其实它更多地反映了作者此时对两大阵线的相同不满。英国学者约翰·奥尔(John Orr)将乔治·奥威尔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康拉德、托马斯·曼、海明威、索尔仁尼琴、扎米亚金等一大批作家通称为 20 世纪的“悲剧式现实主义”(Tragic Realism)作家, 并说:“悲剧式现实主义在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和极权国家的两极展开, 虽然这之间是马克思与齐美尔的差距, 但是历史性的两大国际阵营的分裂使悲剧式现实主义产生了世界性的反响……真正应该起作用的东西缺席让众作家心怀悲伤。”^[2]

还有学者提出, 相比之下, 奥威尔更了解下层, 赫胥黎讽刺上层, 奥威尔揭示了政治运动的内幕, 赫胥黎指出了社会现象后的真相。赫胥黎对科技, 就像奥威尔对政治一样擅长。……奥威尔小说的“问题”在于: 人物缺乏性格, 形式谈不上创新。因为他总是为自己最熟悉的政治主题而寻找合适形式: 寓言和反乌托邦。“不过他对这两种形式应用得都很好。”^{[3](125-152)}这种评价反过来也提醒我们, 阅读政治寓言小说, 其主要魅力不是形象, 而是思想、观点和洞察力。

一、造反为什么有理?

小说的情节看上去像童书一样简单, 因为故事的开头与结局是一个奇异的轮转, 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个叫琼斯的英国人在曼纳庄园中饲养了许多动物。这天, 一只叫麦哲的老公猪向其他动物谈了自己的晚年感想, 号召动物们起来“造反”, “推翻人类”。老麦哲的话果然促使动物们揭竿而起, 赶走了主人琼斯, 并在“牛棚大战”中获得了动物对人类的决定性胜利。于是动物们开始自己管理农场, 将曼纳庄园正式更名为“动物庄园”。……可惜三五年后, 一只叫拿破仑的公猪成为了动物庄园的新独裁者, 并且公开与罪恶的人类同流合污、相互勾结、欺压和剥削其他动物同类。

一般而言, 政治寓言小说总有明显的象征所指, 比如“动物庄园”的产生, 应该象征着 20 世纪许多新生民族国家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后的全新创建, 其道路则是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模式, 即主要是基层无产阶级或下层劳苦大众接受先进知识之后, 具有了民族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觉醒, 从而振臂高呼、揭竿而起、不怕牺牲、浴血奋战, 最终彻底推翻了旧的统治, 建

收稿日期: 2008 - 02 - 01

作者简介: 潘一禾(1959 -), 女, 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立起代表自己意志的新政权和新政府机构。

回头看去,那些轰轰烈烈的“造反”是相当成功的,但革命的结果却往往违背大多数造反者的初衷,许多新兴民族国家重新回到了与解放和革命之前相似的旧社会体制之中,甚至更糟。因为新的统治者更了解自己的“战友”和同伴,新的压迫和控制手段比旧的统治者更有效和更成熟,也更具有合法性。在小说的结尾处,动物庄园与原先的共同体理想越走越远,读者已经再一次嗅到了造反革命之前的暴风骤雨气息。那么奥威尔的这个政治寓言是否想说明政治世界变化常常是一次次轮转?并且一直在不断地轮回?如新领袖因为不断增长的民意而诞生,但很快又因为民众的普遍不满而失去连任的选票。如反对党总是以“反腐败”而登台,但不久又因为“腐败”而下台。

不妨先来审视一下政治小说《动物庄园》中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人类代表。他们或者陋习缠身,或者品德败坏。如琼斯先生原是一位冷酷而又能干的庄园主,但因为打官司赔了钱后就开始酗酒,每天懒洋洋地呆在厨房里,他的伙计们也變得无所事事,而且都很不老实,趁着琼斯先生不在时就偷懒作乱,结果田园无人照管,动物们也饥肠辘辘。动物们的最终暴动的那天,正是因为一整天没有人喂养,动物们都集体饿得挣不下去了。

另两个人类代表就是相邻的福克斯庄园主皮尔·金顿和平彻菲尔德庄园主弗雷德里克。这两个精明的商人平时彼此矛盾重重,但在曼纳庄园刚失陷时都兴高采烈,认为竞争对手的失意会对自己有利。尔后又因为担心自己庄园的动物也跟着造反,便大力收集动物庄园的丑闻和恶事,说它们的造反是有悖于天理的。这两个庄园主还曾经联手其他庄园的人一起前去武力镇压。在“牛棚大战”中吃了败仗后又都不遗余力地要认可动物庄园的合法性,宣布自己要与动物庄园的新统治者消除歧见、改善关系……实际是狼狈为奸,合作欺诈动物劳动者的血汗。所以说,旧的统治阶级确实不称职,而且坏得应该被彻底推翻,这就是动物们造反的正当理由之一。

问题是,为什么合理的动物造反者们很快就发现它们自己的代表并不见得比旧统治者更好,相反,它们不过是同一类坏蛋?由此就必须注意这些群众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引导的“造反者们”又具有怎样的思想基础和作战目的。造反思想的首创者和发起人是“公猪老麦哲”。小说写道,在曼纳庄园被推翻之前,公猪老麦哲出于个人良知和责任,在感觉自己临近死亡之际,向众动物说出了自己对现实的“终极认识”。

“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凄惨而艰辛。一生下来,我们得到的食物不过仅仅使我们苟延残喘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我们便会被驱打着去干活,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了,我们就会在难以置信的残忍下被宰杀。……”

“人是惟一种不事生产、专会挥霍的东西。……只有赶走了人,我们的劳动所得才会全部归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在几乎一夜之间,变得富裕而自由。那么我们应该干什么呢?……造反!……我确信,总有一天,正义要伸张。……未来的一代一代动物会继续这一斗争,直到取得胜利。……要记住,在同人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要模仿他们。即使征服了他们,也绝不沿用他们的恶习。……最重要的是,任何动物都不能欺压自己的同类。……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

也许可以将令人喷饭的老麦哲演讲视为作者的一次高明讽刺,重点讽刺的是20世纪少数革命领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和传播。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极端主义情绪、绝对的思维方式和对未来社会的幼稚化遐想。比如人生是不应该有苦难的,有了苦难就必定有个让“我”受难的罪人(或罪人们、罪他类)。一旦“我”(或我们)赶走了这个唯一的敌人,就能永远地不再忍饥受难。虽然造反也是困难和危险的,但一旦造反成功,我(或我们)就能在一夜间获得自由和变得富有,并且一直自由和富有下去。我一定要与我的敌人划清界限,我与我的同类是一律平等的,但绝不能以为与非我族类也有“共同利益”。人与动物或他人相互依存、一荣俱荣?那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永远只为自己着想,好人也必须这样,否则敌人就会首先消灭了我们这些世代一直如此

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好人们……

对身处下层的阶级而言,公猪老麦哲首创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在理的。同时也是相当煽情、打动“我”心和富有号召力的,因为它态度诚恳、语重心长,不为自己,只为他人和后人着想。因为它无所畏惧、敢想敢说、思考深刻,而且语气中充满对同类的自豪和互信。还因为它不仅将动物的造反必将成功看成是斩钉截铁的,而且将成功后的美好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近在咫尺。公猪老麦哲以其毕生经历和不竭的探索,不仅明确指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并且努力寻找造成动物们一生痛苦和备受奴役的“唯一根源”、唯一现存敌人。它还十分明白地暗示革命的事情很简单,只要勇敢、坚持不懈,就能造反成功,而一旦造反成功,将敌人的权和钱、房子和所有东西夺回来,未来的日子就一片光明灿烂了。这些理论说辞在奥威尔的笔下变得很幼稚可笑,但在人类的政治生活史上却并没有真正绝迹。

公猪老麦哲的演讲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庄园中比较聪明的动物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观念,老麦哲的满腔义愤和强烈革命愿望也鼓动起了尽快起来“造反”的集体雄心。老麦哲还不忘教会动物们唱一首古老的、父辈留传下来的革命歌曲:“英格兰兽”,追求自由独立的歌词和集体加入的嘹亮歌声都让动物们“陷入一种情不自禁的亢奋当中”。于是,造反事件终于爆发在某个饥饿难当的晚上,动物们在毫无任何事先预谋的情况下,仅凭自发的冲动和自爱的本能,就轻而易举地将那些万恶的人类主人驱逐出了曼纳庄园。

奥威尔告诉我们,启蒙革命和鼓动造反的思想家为了让群众觉醒和追随,常常采用公猪老麦哲式的思考和宣讲方式,即,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多层的社会矛盾两极化,用坚定的口气许诺革命后的幸福生活,并且强调说那种新世界的安宁富裕是永远的、极乐的、前所未有的。其实这往往是政治工作向外宣传的一面,政治家总是将他们真正的意图和权力追求放在那些说给大众听的简单口号背后,民众很快就会在革命后的事实面前感到极度失望、难以理解,而同时又无可奈何。政治家们这么做的原因同样也是复杂的,除了政治家自身的考量之外,我们必须还要关注事件的本身、民众的水平和历史的机遇等。

在造反之前,公猪老麦哲显然集中强调了动物们正在遭受的苦难,将苦难的根源全部归结于外部的敌人和他者,为的是唤起动物们心中的委屈感和仇恨心,唤醒他们普遍具有的自爱、自怜本能和报仇雪恨的原欲。被唤醒和鼓励的原欲与本能,加上简单的理性和昂扬的情绪,使得动物们能够成功地造反。但可恨的是,动物们却不能继续借此本能和原欲的余威,去成功地建设新家园。

二、开国的喜悦和最初的原则

公猪老麦哲在造反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造反是由杰出的斯诺鲍、拿破仑和斯奎拉这三猪“领导”的,或者说它们三猪首先从革命中脱颖而出。更具有群众代表意义的是,它们三猪从革命前的三个月秘密活动中,就已经在老麦哲的训导中共同推敲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动物主义”,斯诺鲍进一步将之总结成“七诫”。

“造反”胜利之后的第一天早上,动物们集体登高,以全新的眼光欣赏了自己的家园,以目瞪口呆的神情参观了原庄园主琼斯的众多内屋和豪华卧室。到了夜晚,动物们还沉浸在极端主义的亢奋情绪之中,它们将有可能让人回想起曼纳庄园和人类的东西全都点火烧净,临睡前还将“英格兰兽”整整唱了七遍。第二天早上,动物们发现斯诺鲍已经把大家赞成的动物主义“七诫”写在了墙上:凡靠两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凡靠四肢行走者,或者长翅膀者,皆为亲友;任何动物不得着衣;任何动物不得卧床;任何动物不得饮酒;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显然,“七诫”中充满了平等的精神和纪律的意识,同时还充满了对认定“敌人”的深仇大恨。没有对敌人的恨,就没有对同类的爱。

动物庄园的新政治制度建设也立即开始行动了。早餐之后,有一项每周都要举行的仪式,从不例外,先是升旗,然后是所有动物列队进入大谷仓,参加一个名为“大会议”的全体会议,在这里将

规划出有关下一周的工作,提出和讨论各项决议。问题是,提出议题的总是更聪明的猪,别的动物知道怎样表决,但从未能自己提出任何议题。最为活跃的是斯诺鲍和拿破仑,但显而易见,它们两人一直合不来。大会议总是在“英格兰兽”的歌声中结束,下午主要是动物们的娱乐时间。庄园里的其他政治活动也可圈可点,在斯诺鲍的主持下,动物们相继成立了“动物委员会”、“产蛋委员会”、“洁尾社”、“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掀起了“羊毛更白运动”,等等。为了让动物们都能读懂和记住“七诫”,斯诺鲍还组建了一个读写班。多数动物很快被扫了盲。如多数的猪都能十分熟练地读写,狗的阅读能力也相当不错,一头叫本杰明的驴读得不比任何猪逊色,但一匹叫鲍克瑟的雄马却只能记得四个字母,羊和鸡鸭也都学不会。禽鸟更是什么也弄不懂。于是斯诺鲍决定对比较愚笨的学员用更简单的新准则进行教学,很快,众羊们就学会了咩咩“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新简明原则。

由于直接参政,大伙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做了主人的动物们面对重重困难,充满希望地卖力工作,农场一派新景象。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建设家园的辛苦工作中,每类动物都被分配了比旧主人琼斯在位时更多的苦活,但它们并不抱怨。动物们都希望通过辛苦劳动,大家一起迎接农业丰收和工业发达,吃得越来越好、干得越来越少、家园越来越富强。但在第一天收工的晚上,动物们就发现原来全部属于琼斯的牛奶现在并没有按需分配,而是悄悄地被少数猪占有了。

只要有聚居,就会有组织和领导。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就会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只要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就会既有文斗又有武斗,因为权力本身就是运用实力(武力和软实力)的意思。所以动物主义“七诫”中最重要的后两条“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也许就不是可以用来实践的:最高政治权力的公开竞争从一开始就硝烟四起了,最初主要体现在拿破仑和斯诺鲍之间。

三、政治角逐中的赢家与伎俩

斯诺鲍是一只具有独立意识、公共意识、理性意识和领袖意识的公猪。它多才多艺,在改制、改组、改建和改造人心的工作中都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不过它的想法在最初的试验中进行得并不顺利。虽然它文理兼修,既善于交谈和组织,又能利用科学知识进行庄园重大项目“风车”的设计,但能真正听懂它的话和明白它的用意的动物很少,读得懂它意思的动物除了竞争对手、另一头公猪拿破仑之外,就剩驴子本杰明了。

从象征的角度看,公猪斯诺鲍和驴子本杰明都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本杰明是一个目光犀利、头脑清楚但却有厌世情绪的“爱发牢骚者”,它总是说些带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的奇谈怪语。本杰明虽然特别同情最富“老黄牛”精神的老马鲍克瑟,但对斯诺鲍的言行却不愿发表意见和出手援助。在整个政治进程中,它既没有阻挡过拿破仑的行动,也没有支持过斯诺鲍的计划。从这个角度看,驴子本杰明象征的是自觉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英雄”,它虽然不是专制统治者拿破仑的直接帮凶或走狗,但关键时刻的“不表态”或沉默是客观上的“不作为”和暗中支持。虽然它的清醒和背后言论常常也会让人产生敬佩,但那些夹着牢骚的“启蒙”和渗透厌世情绪的“明白”,更多地显示着它个人的才华,积累着它个人的名望,与世无甚大害,也谈不上有大补。最主要的积极意义就是保留了一些独立思想的火种。

相反,公猪斯诺鲍象征的是敢于亮相的“持不同政见者”,它不仅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和理想,而且言行一致、言后即行,以自己的方式率先勇敢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品种公猪斯诺鲍出众的才德和勇气显然斗不过特殊品种公猪拿破仑的强权。

公猪拿破仑是庄园中唯一的一只伯克夏种猪,个头高大而且动作凶猛。它一开始就对斯诺鲍主持创建的各种委员会毫无兴趣,认为新政府与其教育年龄不一的全体动物,不如尽早教育年轻一代。所以它迅速地将九条刚刚断奶的小狗从父母身边带走,关在与世隔离的阁楼上亲自进行“教育”。然后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借助凶狠异常的众狼狗之势,一举将斯诺鲍赶出动物庄园,从此无影无踪。在以后的统治中,它又一次次地借用这群凶狠的狗对反抗者和怀疑者施以严法和酷刑。如果说拿破仑

的训狗和用狗方式体现了“铁腕型”统治者对强权手腕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滥用,那么它的说话更是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它的主要欺骗话语工程有四项:一是琼斯和人类是动物的“死敌”说,二是琼斯和人类将随时“打回来”说,三是斯诺鲍身还在、心不死,早已经安插好密探的“阴谋”说和“间谍”说,四是庄园领导的职责“艰辛而繁重”,为了决策不失误而不得不像人类一样生活的“脑力劳动者更辛苦”说。

拿破仑更具有欺骗性的统治工程就是“风车”项目。它在擅自将斯诺鲍的原设计据为己有后,就强迫动物们在建设“风车”项目的庞大工作任务中流血流汗、加班加点,而自己却在工程项目中倒卖材料谋利,大发横财。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意地让“风车”工程几起几落,让完工后的“新生活”神话一拖再拖。最后,“风车”工程不仅活活累死了劳动模范鲍克瑟,而且让参加造反的“老一辈”都逐渐成为“老弱病残”,新生的动物们大都在动物庄园的新式教育中头脑简单、毫无个性,对没完没了的“风车”工程更是不解其义又不得不每天每日地充当苦工。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风车”工程越来越像一个荒唐而毫无意义的“伟业”,它不过是统治者可以经常用来动员民众和役使民众的政治手腕。拿破仑的计谋就是让类似的重大工程永远不能最终完成,而如此一来,众动物就会在将有限生命投身家园建设千秋功业的号召中,在绝对命令和神圣使命感的妙意结合中,一个个或一只只的都忠心耿耿、服从命令、辛苦干活,回首往事也无怨无悔了。

显然,拿破仑式的文武双全型凶残统治连动物们都受不了,更不用说人类了。

奥威尔让我们在忍俊不禁的阅读过程中清醒地意识到,公猪拿破仑的思路与它反对的原庄主琼斯不仅一模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小说并没有证明拿破仑天生如此、祖辈遗传或生性恶毒,但因此也促使读者从全面深入的角度思考这个动物独裁者的产生机制。拿破仑身高力大,的确给了它某些客观优势,促使它比其他动物更向往权力;天资聪明过人和行事果断利索的习惯,也让它能轻易地洞察时世和其他动物内心;熟悉统治技艺和娴熟运用各种政治权术,使它更懂得如何从激烈竞争中获取权力和长期地稳住权势。最后,拿破仑制定出的一系列“高明”骗术,屡屡在庄园内外显灵和得手,说明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确也没有能与之相抗衡的政治智慧和重量级政治人物。由斯诺鲍代表的现代民主议政模式,显然无法在这么一个造反的动物群中得到理解和拥有,更遑论实施、改进和维护。在一个各项条件尚未成熟的历史时刻,斯诺鲍式的简单直接试验,需要政治权力的全力保护和支持,但斯诺鲍显然有些一意冒进。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斯诺鲍丝毫没有对拿破仑的强权意识和铁腕言行作出半点警惕的反应和防范的准备,这也是它必然要被拿破仑打败的重要原因。斯诺鲍的失败,实际上也严重打击了其他动物的平常政治期待和潜在支持可能。

不受监督的权力本身的危险性也有重点描述,如拿破仑的贪欲和专制个性都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历程,在它凭借狗势赶走斯诺鲍登上第一把手宝座之后,在权力、物质和声色上就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在行使权力时也越来越张狂无忌,直至与旧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动物们最初信奉的“七诫”虽然对掌权者有一定规范作用,但对强权者而言,又是形同虚设和可以随意修改的。到了小说结尾处,动物庄园的上空时刻笼罩着专制意识形态的阴霾,动物们都不许有个性、不准说真话,事实上,动物们也已经丧失本性,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话了。老一辈动物革命家要么在思想清洗运动中被整死,要么在和平的建设中被累死。整个社会的戒律变得只剩一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平等一词,本无比较级。“更加平等”即意味着不平等,极权主义的实质已经欲盖弥彰。“革命的激情源于平等的激情,但结果却是另一些人更平等。由于自由缺席,自由反对的缺席,就必须追上部分人更平等。革命回到了原点,前进变成了倒退。”^{[3](125-152)} 乔治·奥威尔的尖刻讽刺真是逼人清醒。

四、帝王周围和手下的人

斯奎拉是个指鹿为马的宣传家,象征的是独裁者身边常见的“戈培尔”式宣传部长。斯奎拉能言善辩,描述一件事总是生动形象、活龙活现,描述一件不存在的事(也就是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也

可以让听的人觉得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它对自己的责任十分清楚，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刻，也就是出现权力的信任危机时刻，就以口号式语言、极端式思维和两极划分意识来提醒动物们：

勇敢是不够的，忠诚和服从更为重要。

纪律，同志们，铁的纪律！这是我们今天的口号。

一步走错，我们的仇敌就会来颠覆我们。

斯奎拉有许多用语言暴力征服动物大脑的拿手好戏。一是借助拿破仑的强权垄断动物庄园的话语权，仅让极少数指定动物说话和提议，其他动物只能表决和表态，这当然是高压下的表决或表态。所以当动物庄园宣布成立公猪老麦哲曾设想的“动物共和国”时，拿破仑作为唯一候选人以100%的选票当选第一届总统。二是不断改写历史，按照现行统治集团的利益和需要来修改历史，垄断动物们的意识形态。例如斯奎拉让类似“斯诺鲍一开始就是叛徒”的谎言不断被重复，被添加成份地重复，让谎言越说越圆、越说越像是真相，直至说出“斯诺鲍的密探正在我们中间潜伏着！”由此又将对动物的宣传改造工作与秘密警察工作直接挂起钩来。在酷刑的威胁下，不仅动物们的历史记忆因此被磨灭了，而且幸存者们都不再对暴政和公开的丑剧感到惊奇。三是斯奎拉不断地与动物们讨论庄园的今昔对比，因为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那么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由此既混淆了是非，又强化了简单的两极思维方式。任何想法都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绝不存在第三种道路。而一旦思想上的二元对立模式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也就不再留有反对者可能与之讨论的余地了。四是斯奎拉不断强调外在的假想敌，当内部矛盾激化时，就利用外敌一直是严重威胁，随时可能入侵来转移民众视线。斯奎拉常用“你们谁都不希望看到琼斯回来吧”这句话来质询任何可能的质疑或困惑，这句话很快就成为一切有异议和不满者头上的紧箍咒。五是运用语言“忽悠”技巧移花接木、颠倒黑白。如：

“同志们，不要以为当领导是一种享受！恰恰相反，它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职责。

“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

斯奎拉的软实力与拿破仑的硬实力确实是里外结合，从精神到肉体完全控制了动物庄园。这种结合方式正是奥威尔最为担忧的现代极权主义统治方式。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斯奎拉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但它也有自己的得力助手。梅尼缪斯是一只善于谱曲作诗的肉猪，“具有非凡的天赋”，象征的是各种专制国家都十分需要的文人墨客。在拿破仑下令废止“英格兰兽”之歌后，梅尼缪斯很快就谱写了新歌：“动物庄园，动物庄园，我绝不允许损您之事出现！……”在低级动物们逐渐被斯奎拉改造成只会说拿破仑是“动物之父”、“人类克星”、“羊的保护神”、“鸭子的至亲”后，梅尼缪斯专门编写了名为“拿破仑同志”的长诗，开头一段是：“孤儿之至亲！幸福之源泉！赐给食料的恩主！您双目坚毅沉静，如日当空，仰望着您，啊！我满怀激情，拿破仑同志！”拿破仑对这首诗很欣赏，让它刻在了七诫的对面墙上，诗的上方是拿破仑的巨大肖像。

奥威尔很严肃地强调，专制强权不仅出于个人野心和权力诱惑，而且往往还有自己的民众基础，在这之中，投靠强权以分享权力的是一部分人，如斯奎拉和梅尼缪斯；忠诚朴实和头脑简单，最后被权力屠宰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是另一部分人，如劳动最卖力的老马鲍克瑟和它忠贞贤惠的母马克拉弗。动物庄园里还有许多没有名字的“沉默大多数”，它们往往是麻木愚昧、担惊受怕、谨小慎微而又自私自利。赶走琼斯时，有动物担心没有主人的话，物质生活会失去保障，有动物提出如果造反迟早要发生，那么我们造不造反又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在讨论耗子是不是“一律平等”的动物时，大多数动物投了赞成票，但狗和猫分别投了赞成和反对票。在斯诺鲍组织动物们学习认字和理解“七诫”时，动物的聪明才智显然是天生不平等的，而且它们的品德也是天生不平等的。喜欢打扮的母马

莫丽原来是用来套琼斯的座车的,动物庄园一建立,她就不适应新的劳动者生活而偷偷投奔了威灵顿的客店老板。被驯化的乌鸦摩西永远说着什么“蜜糖山”的空洞神话,动物们都不信,拿破仑却允许它每天不干活,还有啤酒作补贴。鲍克瑟的妻子克拉弗和白山羊穆丽尔都是能识文断字的动物,但她们在目睹“七诫”被任意修改,看到自己当年浴血奋战的成果被五个穷奢极欲的败类篡夺,虽然也曾想不通,也曾觉得不对头,但思考的结果总是“一下也说不清楚”。

天性很好,品德就像“老黄牛”的老马鲍克瑟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动物形象。它忠心耿耿地为动物庄园工作,总是在最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承担最重的体力活。它每天的工作量总是普通人的三五倍,而且从无怨言和牢骚。它一生挂在口头的两句口头禅是“我要更努力地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它从不思考,没有疑惑,仿佛干得辛苦才能活得充实愉快,听谁说话就被谁说服。鲍克瑟在动物中威信很高,骄傲的驴子本杰明也视它为最可信的朋友。当它临死时,它说,如果自己还能活三年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增长才智”。总之,这是一匹人见人爱的马。专制者和大众都喜欢它。统治者喜欢它为自己卖命,大众喜欢它干活走在前面。但是像鲍克瑟这样的好马在动物群中的比例总是十分有限的。它也会在常年劳累中变得年迈、力竭、跌倒和临近死亡的。鲍克瑟快死时,拿破仑和斯奎拉毫不犹豫地将它卖给了屠宰公司,它的那张皮和一堆骨头为新主人换得了一箱威士忌。不仅如此,鲍克瑟的“精神”还有继续利用的价值。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们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鲍克瑟的言行说明动物庄园被“全面控制”——通过控制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外在行为和活动——的目的是充分生效的。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动物与人不再有区别,有学者认为这“表明暴力革命的摧毁性影响,奥威尔认为这是所有革命都可能造成的摧毁性影响。……另一含义是指工业文明导致人的自然本能逐渐丧失,动物更具本能和自然生活,但当它们开始享受电话等工业文明后,本能也被摧毁。奥威尔认为这些本能必须保护”。^{[3](125-152)}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正像充满美好幸福的正面乌托邦社会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样,动物庄园式的反面乌托邦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奥威尔的预警和抗议是十分有效和有益无害的。他对劳动大众的深深同情,对压迫奴役之苦的逼真描绘,对武力强权和思想暴力的勇敢揭露和坚决抵制,都是感人肺腑的。《动物庄园》中的乌托邦从建立到衰坏,迅速地从起点回到了起点,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奥威尔希望后人能找到走出政治幽暗、摆脱“西西福斯式”命运的道路。同时,即使由于人性本身的缺陷,或者由于人类政治智慧的有限,这种可怕的政治倒退和循环仍然在时不时作怪,奥威尔也希望人们也应该能懂得个体如何应对。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错误或历史性的转折,都可能导致诸多个体生命价值的彻底葬送。

参考文献

- [1] 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M]. 张毅, 高孝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2] JOHN O. Tragic re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the passionate political in the modern novel[M]. Edinburgh: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176 - 187.
- [3] YASHODA B. Aldous Huxley and George Orwel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tire in their novels[M].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Rt. Ltd, 1991: 125 - 152.

(下转第68页)